

巍山彝學研究

第一集

巍山彝學會編



巍山彝学研究

第一集

巍山县彝学分会 编

一九九六年二月

大理州彝族学学会巍山县分会
组织成员名单

理事18人（按姓氏笔划排列）

左育能	左岐宏	左惠英(女)	
字绍华	字凤祥	字现文	朱敬文
闭自隆	李春茂	李继武	杨平侠
杨向良	罗永根	罗国安	罗光位
茶忠旺	赫清良	彭增梅(女)	

常务理事7人

罗永根	李春茂	字绍华	字凤祥
左育能	左岐宏	杨平侠	

会 长：罗永根

副会长：李春茂 字绍华 字凤祥

左育能（常务） 左岐宏

秘书长：杨平侠

副秘书长：李继武 字现文

序

罗永根（彝族）

巍山是一个民族自治县，除了自治民族彝族、回族外，还居住、生活着汉族、白族、苗族、傈僳等二十多个民族。巍山是个民族大家庭。党历来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做好民族工作从现实讲除了认真抓好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科学事业，培养大批民族人才外，对民族历史、文化、科学、伦理、生产活动、生活习俗的调查、研究、总结，十分重要。这就是民族学。马列主义所涉及的众多学科中，民族学是其中一门重要的社会学科。马克思、恩格斯写了许多有关民族学方面的著作，如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巍山历史悠久，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灿烂历史和文化。如回族的杜文秀起义，彝族的南诏等等。这些史实不但是本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民族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为此，做好民族学的研究工作，对宏扬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变精神为物质，对当前祖国“四化”建设，对振兴巍山都有很大益处。

《巍山彝学研究》是由我县彝学会办的第一个民族学研究刊物，这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团结广大科学文化、历史考古，教育卫生，政治经济工作者，企业家，客观地、历史地、唯物辩证地，积极进行彝学研究和推广工作，为发展和繁荣巍山县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振兴巍山经济，做出贡献。

一九九六年一月

前 言

彝族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彝族共有545万，仅次于壮、回、维吾尔，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四位。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远的暂不说，自公元前二世纪到现在，已有2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程。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彝族人民，同周围其他兄弟民族一起，战天斗地，开发祖国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创造了具有鲜明历史特点的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天文科学及历法，哲学伦理以及生活习俗。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作了贡献。

巍山，是实行彝族、回族自治，居住着23个民族，拥有近三十万人口的民族自治县。俱1995年底全县人口统计，居住巍山县内的彝族共94,327人，占全县总人口285290人的百分之34.04%。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渊源流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前，今巍山彝族的先民就先以游牧，后事农桑，定居巍山坝子。

根据史料记载：巍山的土著民族——彝族，先秦初期主要属氏羌系统部落群体。秦汉时期，巍山土著民族被称之为“西

南夷”。《礼·五制》载：“东方曰夷”，当时夷是对西南众少数民族的通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巍山土著民族被称之为“叟”，“乌蛮”。当时的“乌蛮”除了现今的彝族外，还包括现今纳西、傈僳等少数民族。隋、唐、五代时期，巍山土著民族仍称“乌蛮”，但这时的“乌蛮”已专指今天的彝族，再不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了。到了宋、元、明、清四朝，巍山土著民族被称之为“罗罗”，自称为“腊罗”，“迷撒”，“蒙舍”、“土家”等，直至解放后，根据民族识别正式定称为彝族。

巍山境内的彝族有两个支系，即“腊罗”支系和“格尼”支系。“腊罗”，音译，即“龙虎”的意思。“腊罗”是最早进入巍山的居民。在“新石器”前后就在巍山坝子耕牧，繁衍。唐初贞观年间，从哀牢山麓迁来“乌蛮”蒙氏，即《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中称之的哀牢夷。传说哀牢夷的先祖叫九隆，又称之为“九隆之后”。“乌蛮”蒙氏与境内的“腊罗”是同一族属，因而就很快地溶合在“腊罗”群体里。“格尼”支系迁入巍山最迟，是清朝后期先从今弥渡县迁至今南涧县，再从南涧县迁入今青华乡的。“格尼”支系人口较少，只占巍山彝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

巍山历史悠久，开发较早，是彝族为主体在唐初建立的威镇祖国西南边陲二百多年的(大)南诏国发祥地。唐贞观初，从今保山迁徙到巍山的哀牢夷，称之为“九隆之后”的蒙氏大姓细奴逻，溶合生活于巍山的同族中二十余年后，由于其才智、胆略过人，深受同民族同胞的拥戴，于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当了当时位于今巍山坝子南部的蒙舍诏主，改国号“大蒙国”，自称“奇王”。因蒙舍诏位居洱海盆地之南，又称

“南诏”。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王朝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从细奴逻至皮逻阁，蒙氏在巍山经营了四代霸业，计九十年。由于细奴逻、逻盛、盛逻皮、皮逻阁四代诏主的勤耕励治，加之中原唐王朝的扶持，蒙舍诏发展壮大，称霸一方。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逻阁在唐王朝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征战，统一了洱海地区的其它五诏，建立了南诏国。后皮逻阁又传位九代计190年。南诏地方民族政权（包括前期的蒙舍诏），传位十三代，计250年，几乎与唐朝相始终。南诏国的建立，开拓了云南行省版图，对巩固祖国西南边疆，发展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科学、生产，作了重大贡献。

中原封建王朝从元代后期在巍山实行“以夷治夷”的“土流合治”政体。蒙氏细奴逻后裔左氏，从左禾起世袭蒙化土知府、土知州十八代、近五百年，历经元、明、清三朝，是中央在边疆“江迄”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土流合治”最长的地区。

巍山彝族先民不但勤劳勇敢，还酷爱知识学习，蒙舍诏时期，细奴逻、逻盛等诏主就选派大批蒙氏子弟赴巴蜀成都就学，诏内曾把王羲之奉为“圣人”。到了明代，土司左政等：在今巍山县城内盖建了“孔庙”，推崇儒学，鼓励彝族子弟勤奋读书。俱《蒙化志稿》记载：从明朝正德年间至清朝光绪年间，蒙化（今巍山）中过21个进士，其中有三名是彝族，至于举人、贡生、秀才，彝族考中者不计其数。由于巍山彝族、回族、汉族等各民族先民的勤学奋进，清朝乾隆年间，蒙化（今巍山）被清朝庭誉为“文献名邦”。

新、旧民主革命时期，巍山彝族先民又涌现了不少为新中国诞生而流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同回族、汉族、白族、苗族等

兄弟，为“文献名邦”涂上了灿烂之光。

新中国成立后，巍山彝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回族人民一道实行了民族自治。自治县成立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彝族人民以主人翁的态度，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生产，为建设新巍山，早日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生活，建功立业。

巍山彝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宏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此，对巍山彝族的历史、文化、伦理、习俗，及经济，生产活动等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巍山彝学会自1995年正式成立之初，就把对彝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希望把“巍山彝学研究”办成广大彝学会员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本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生产活动和生活习俗的阵地。这一工作也深得县委、政府及县人大、县政协的支持，和广大会员的拥戴。广大彝学会会员纷纷来稿，爱好彝学研究的其他民族同志也赐稿帮助，所以，我们才能把《巍山彝学研究》第一集奉献给广大彝胞，和彝学爱好者。由于编委水平有限，第一集《巍山彝学研究》难尽人意、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但编委们深信，难的是迈第一步，第一步迈出去了，今后的路子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直。因此，我们希望广大读者，彝学会员，不吝赐教，除了积极来稿外，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把《巍山彝学研究》坚持办下去，并且办得越来越好。

编者 一九九六年元月十日

目 录

蒙化源于蒙舍诏·····	陈赓雅 赵堪同 (1)
试论南诏政权的性质·····	赵堪同 (3)
南诏铁柱与彝族祭柱关系考述·····	盛代昌 (7)
浅论南诏铁柱的崇拜是早期山地民族树崇拜 的传承·····	张 昭 (14)
浅述龙于图城的建筑年代·····	罗扬奇(彝) (23)
南诏德化碑与南诏古迹雒议·····	左歧宏(彝) (26)
简述昆明市东寺塔、西寺塔、白塔·····	左富先 (31)
浅谈史学界对南诏王族族属问题的争论·····	杨平侠 (33)
龙于图山南诏石刻造像艺术·····	刘喜树 (41)
中国彝族服饰演变·····	邓承礼(彝) (48)
彝族留今回民聚居地——小围埂一带的遗物 遗址调查·····	马育文(回) (52)
发掘彝族医学 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左育能(彝) (55)
南诏后裔——巍山彝族饮食文化·····	左佐(女·彝族) (60)
从村规民约看彝族山区社会发展·····	···杨绍兴(白)陈时鸿 (66)
彝族自然村——水资路基本情况调查·····	茶应东(彝) (78)
发掘巍山民族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探索·····	·····字开春(彝) (80)
巍山待开发的宝贵资源——南诏历史文化·····	范建伟 (85)
南诏德化碑·····	(88)
南诏王位世袭表	

“蒙化”源于蒙舍诏

陈赓雅 赵堪同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在唐代为蒙舍诏地，元初置蒙舍千户所，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改为蒙化府。明清两代及民国期间，均沿用蒙化作行政区划名。解放后，于1954年，以“蒙化带有侮辱少数民族的含义”，故改县名为巍山。

其实，“蒙化”这一名称，系出自蒙舍诏，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蒙化府”载：“境内有摩察者，为黑爨之别种也，传云，昔从细奴逻来，徙居此。”向达《蛮书校注》说“摩察乃蒙舍之异译，又作‘木察’、‘麦岔’、‘密叉’，巍山彝族，自称‘密撒泼’。”这说明了巍山彝族自治蒙舍诏后，大都以“摩察”、“密岔”、“密撒”，（现已通称密沙把）等作为自己的族称，如译为汉义，系指“蒙舍川的人”。

又据《蒙化志稿》“玄龙寺条”载：“相传蒙舍诏时蜀人有黄白之术售于蒙者，蒙人因即其地设蒙化观为修炼之所。”则蒙化之名，于蒙舍诏时即已出现。“舍”“化”在平水韵中同属禡韵，可以通转，所以“蒙化观”当是蒙舍川的派生地名，“蒙化”的涵义应从蒙舍，事实上“蒙化”即“蒙舍”的异写，也是“密沙”的对音，蒙化是以巍山彝族的族称命名，不能视为汉语地名而作望文生义的解释。

元改蒙舍千户所为蒙化府，应视为是蒙舍诏的继续，元代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地名的命名上，不大可能表现大汉族主义。

1935年冬到1936年春，中缅进行勘界，现任云南省参事黄丽天和昆明市参事室参事朱家修两同志（均蒙化人），曾参加其工作，据说当时他们从双江县澜沧县上允、下允两地，又从班洪去勐董（现为佤族自治县），在路上都遇见有几个“蒙化寨”，寨里人说：他们的祖先，是由蒙化迁移去的蒙化族，每寨有二、三百户，一千多人口，各寨有一个共同的风俗，不与别族人通婚。

解放前，赓雅因公去江外猛弄，路过新街（今改为元阳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两个山寨，自称为蒙化村。近年在东南亚的侨胞与家人通信，仍称蒙化县而不知有巍山县。

1928年至1931年前后，张冲同志任大理镇守使，曾几次到过蒙化，对于蒙化地方史志有一定研究。解放后，他见报载蒙化改为巍山，对赓雅说：“在清乾隆年间，蒙化以尚文敦礼，人才辈出，而被清廷封为全省四个‘文献名邦’府厅之一。巍山命名，来自巍宝山，仅是一风景区，而蒙化则有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意义，故蒙化县名，仍有沿用的必要。”这番话，我们认为是一定道理的。

由此可见，蒙化县和蒙化族名称，源远流长，富有历史文化意义和民族特征，认为蒙化带有对少数民族侮辱性之说，是不妥的。

试论南诏政权的性质

赵堪同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南诏国、大理国》中说：“南诏是以乌蛮蒙姓为国王，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这就说明了南诏政权是以乌蛮蒙氏为领袖，白蛮大姓为辅佐，集合境内各族人民所组成的统一政权。这个提法，符合历史实际，长期以来，一般对南诏政权的性质，均以此为定论，没有发生过分歧。

近读新出版的《巍山县志》，马曜先生在卷首的序中说：“南诏国的主体居民是居住在坝区的白蛮，他们是南诏赋税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白蛮大姓帮助乌蛮蒙氏……击灭其他乌蛮五诏，……又兼并西爨白蛮，可以这样说，南诏是乌蛮和白蛮贵族共同建立的联合政权。”诵读之余，对“联合政权”之说，感到难以理解，不得不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供作研究南诏历史的参考。

首先根据马曜先生所说，南诏政权之所以是乌蛮和白蛮贵族共同组成的联合政权，第一是因为南诏国的主体居民是居住在坝区的白蛮，他们是赋税和兵役的主要承担者。第二是因为白蛮大姓帮助乌蛮蒙氏，击灭其他五诏，建立了南诏国。

现就以上两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南诏境内的居民，除居住坝区的白蛮外，尚有众多

的居住坝区和广大山区的乌蛮和其它民族，（因《蛮书》已有详细记载，本文不再赘列。）而这些乌蛮和其它蛮的人数，肯定要比居住在坝区的白蛮多。南诏的赋税，主要的是粮食，因为南诏是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据《蛮书》说，从事粮食生产的是“佃人”，也就是农奴，“收刈已毕，官蛮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給禾稻，其余悉输官。”另外还有生金，土人所淘洗得的生金，“纳官十六七八，其余许归私。”而这些从事耕种和淘金的奴隶，当是南诏境内的各族人民，决不会主要是居住坝区的白蛮。再说兵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南诏全国常备兵数为三万，永昌镇就有兵一万，其中一部分当是哀牢人，另一部是勇健善斗的望苴子，也是乌蛮别种。”则常备兵三万中，有一万是永昌境内的乌蛮别种，其余两万，自不可能主要是居住坝区的白蛮。由此可知，南诏的赋税和兵役，并非主要由白蛮承担。即使真的是主要由白蛮承担，也不能就说南诏政权是乌蛮和白蛮共同建立的联合政权。回顾中国历史，满清王朝及元朝的建立，他们赋税和兵役，才真正是主要由汉族承担，但从来没有那一位专家学者说过，清朝和元朝是满汉两族或蒙汉两族共同建立的联合政权。

第二：从中国的历史看，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都必然是由某一个家族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充当领袖，然后在一班谋臣勇将的辅佐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下，击败了敌人，建立了王朝，当上了皇帝，这个家族，也就获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得以世代相承。在建立这个政权的过程中，除了领袖的领导才能起了决定作用外，这些谋臣勇将，对政权的建立，的确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如西汉王朝的建立，和萧和、张良、韩信的全力辅佐是分不开的。又如蜀汉王朝的刘备政权，是在

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指挥和关、张、赵、马、黄的英勇战斗才得以建立起来。再如满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如果没有汉族将领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以及后来的曾、左、彭、胡等中兴名将的负弩前驱，效命疆场，那么结果如何，也就难以预料。但在这些封建王朝的政权结构中，始终要受到一条十分重要的“纲”（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一项基本原则。）所支配，那就是“君为臣纲”，在国家的政权中，君权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具有绝对权威，可以主宰一切，任何一个臣子，不论你的功劳有多大，职位有多高，要是违背了这一条纲，触犯了君权，那就会成为人人皆曰可杀的乱臣贼子。由于这一个君臣关系的存在，也就决定了这个政权不可能是联合政权。从古至今，也还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学者提出过西汉王朝是刘邦和汉三杰的联合政权，蜀汉政权是刘备和孔明的联合政权，或者说满清政权是满汉两族的联合政权。

最后，我们再看南诏国的建立，是在唐王朝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细奴逻，罗盛，盛罗皮三代王在巍山地区80多年的经营，积蓄和壮大了力量，皮罗阁即位后，凭着充实的国力，才能“请合六诏为一”，进军洱海地区，在唐御史严正海，中使王承训的参与指挥和白蛮大姓的辅佐下，蒙氏王室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们的亲自率领和指挥下，经过多次南征北战，才消灭了五诏，征服东方的爨区，奠定了南诏政权的基础，然后又西开寻传，征服了云南西部的裸形、祁鲜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并南败骠国，扩大了南诏的疆土。在南诏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皮罗阁、阁罗凤、异牟寻这三代王的雄才大略英明领导，的确起到了决定作用。唐王朝对南诏王室也誉为“深明豹略，精究龙韬”，从而取得了“波伏西天，草偃南土”的

世业。（见剑南节度使高骈答南诏牒）南诏国清平官、大军将等（多为白蛮大姓）为南诏王室歌功颂德而立的南诏德化碑中说：“我王气受冲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称世雄，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观畔而动，因利兴功，事协神功，有如天启，故能攻城挫敌，取胜如神，以危易安，转祸为福，绍开祖业，覃弘王猷，坐南面而称孤，统东偏而作主。”这些赞誉，决非溢美之词。因此我们在研究南诏历史的时候，对蒙氏王族开创和建立南诏的丰功伟业和文治武功及其领导地位，不能有所忽视，更不应加以贬低。

南诏国建立的过程中，白蛮贵族在蒙氏王族的领导下，的确作出了很大贡献，南诏国建立后，能够“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语见《蛮书》）的清平官和大军将，也大多是白蛮贵族，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一直是由蒙氏王族所牢牢控制，蒙氏王族和白蛮贵族的关系始终是君臣的关系，从政权组织的形式和实质来看，根本体现不出一点“联合政权”的意味。假如真的是联合政权，那么这个联合体内的各种力量，必然要分享权力而轮流执政，但南诏十三代王，并没有那一位是白蛮贵族。

《南诏德化碑》一开始就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后面又说：“有国而治理，居主之美也，有美而不扬，臣子之过也，……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颂德，用传不朽，俾达将来。”这些叙述，深明君臣大义，也可以看出，南诏政权的建立始终是遵循着“君为臣纲”这个基本原则，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性质一样，是一个实行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因此，“南诏政权是乌蛮和白蛮贵族共同建立的联合政权”之说，的确值得商榷。

南诏铁柱与彝族祭柱关系考述

——南诏铁柱研究系列之六

(弥渡县) 盛代昌

南诏铁柱彩云中，柱存人去寺已空。

费辛八方寻根客，众说成林难一同。

“诸葛天威”传野史，“柱号天尊”归世隆。

欲识千年史中谜，笙歌古调唱正宗。

这是笔者研究南诏铁柱的小诗之一，意欲说明南诏铁柱的研究，可从研究祭柱民族入手，是文就想延着这种思路，对南诏铁柱与彝族祭柱关系作一考述，从而对南诏铁柱与彝族，南诏与彝族的关系作一探讨，发表自己的一种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同行。

南诏铁柱，今存于弥渡县城西的太花乡蔡庄村公所铁柱庙村，距城六公里，铁柱立于庙中正殿佛台上，为直圆柱体，高3.3米，胸围102.5厘米，约重2069公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柱身铭文：“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字样，铁柱建立年代应为公元八七二年（唐僖宗懿通十三年），迄今1119年历史。

对于铁柱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历代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客观地作了评价和肯定。清代金石学家阮福在其著作《滇

南古金石录》中说：“滇中文字，元以后颇多，而宋以前绝少，此柱出于唐时，最为稀有”，白族学者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史稿》中也说：“此柱为唐代遗物，其可贵程度不在南诏碑下”。又说：“南诏时期冶铁技术已有很大发展，现在所能见到的遗物只有这棵铁柱，是研究南诏冶铁技术珍贵的实物资料”。著名旅行家方纪，1957年曾亲临铁柱庙考查，并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只是这棵铁柱的建立和保存至今，也已证明了云南兄弟民族的文化 and 力量”。①

回顾云南古代历史，有许多有关铁柱、铜柱、石柱的记载，如马援铜柱、诸葛铁柱、九征铁柱、武侯石柱等。也有许多祭柱的形象文物，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有杀人祭柱的场面，唐代文物《南诏图传》中有张乐进求带领九人祭柱的场面。从文字中记述中得知，南诏时还存在着《铁柱记》和《张氏国史》等地方历史文献。以上所说的柱和祭柱的记载可惜早已不存，唯有南诏铁柱能够保存至今，并且完整的保存了祭柱习俗，为我们研究提供了方便。更可喜的是旧志资料记载中使我们了解到铁柱和祭铁柱的习俗，不只在铁柱庙有，就今本县牛街彝族乡、仍有更古老的铁柱和对铁柱的崇拜，资料说：“铁柱山②在邦毫③之右，距蜜滴（今乡政府驻地）十余里，平地突起一峰，形若铁柱，山上有铁柱庙，寺中有铁柱一节，因取名铁柱山”，清道光年间贡生潘萃景有铁柱山诗云：“僻地谁传景帝（蒙世隆）灵，将山作柱寄芳形。三分未判留仙迹，七纵将来著古亭。玉兔临时风凜凜，罗候（细奴逻）登处草青青，云霄只把神明敬，也有天尊说妙经”。④说明早在蒙氏先王细奴逻时就有铁柱崇拜和祭柱习俗了。

什么民族信仰铁柱，怎样祭祀铁柱？民国《弥渡县志稿》